

吉野作造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與態度的轉變

黃 自 進

- 一、前言
- 二、否定中國革命的由來
- 三、對中國革命觀改變的肇因
- 四、全面支持北伐政策的思想背景
- 五、結論

一、前 言

日本自明治維新（1853-1877）建立現代國家體制以來，無論朝野，對中日關係應如何定位就紛爭不已。概括言之，可分為侵華派與親華派。侵華派認為日本地狹人稠，為求自保，唯有控制資源豐富、腹地廣大的中國，才能够生存；親華派則強調中日之間在十九世紀西方列強東侵之前，關係素稱良好，而是時日本所感受的生存威脅，實為西方列強壓迫所致；日本欲求自保，唯有與中國合作。侵華派向居主流地位，主導日本的外交政策；而親華派則在民間、輿論界享有聲譽，雖無參與外交政策的勢力，卻一直扮演著牽制侵華派的角色，對中國革命的運動，也不無貢獻。兩派的抗爭，歷經明治、大正時期並延續到昭和初期。民國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變之後，隨著親華派勢力的凋落，日本政府也在侵華派的主導下，逐漸選擇了戰爭。回顧中國近代史，日本對中國所造成的傷害，是無庸贅言的，但論及中國革命運動史時，日本親華派人士對革命所提供的援助，也是不容抹殺。中日關係是親是疏，部份因素取決於日本親華派勢力的消長。活躍於大正時期，而沒落於昭和初期，親華派的輿論界泰斗吉野作造個人的起落，無異就是反映日本輿論界兩大派抗爭的歷程。對吉野作造的研究，也是寄望藉由吉野一生在日本輿論界的起伏，來探討日本親華派勢力興起與沒落的前因後果。

吉野作造(1878-1933)^①是戰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以研究中國革命史、西洋政治史及明治政治史而著名，也以鼓吹民主政治、提倡全民選舉而享有聲譽，被時人稱為「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先驅」。大正時期(1912-1926)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政治社會全面爭取民主平等的萌芽時期，它的主要精神是向舊秩序挑戰，並謀求社會多元化。吉野在這個時期開風氣之先，以啟蒙者身分活躍於輿論界。尤其是大正中後期以後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勞工運動，以及大正末期相繼而起的新興政黨，例如社會民眾黨等，都與他淵源深厚。^②因此他的言行自然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吉野早期對中國革命一直持反對態度，民國四、五年(1915-1916)護國軍起義討袁，吉野著手研究中國革命史，對革命的態度遂逐漸改變，由反對轉為同情，從此就一直以親革命黨人自居，不時發表時論批評日本對華政策的不當，可謂日本戰前親華派的輿論代表。戰後以來，研究吉野與中國關係的論文，不勝枚舉。^③但

① 吉野作造生於1878年，是日本宮城縣古川市人。1904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奠定了他往後在日本學術界發展的基礎。同年進入母校研究所，繼續深造。1906年在母校師長梅謙次郎的介紹下，到中國擔任袁克定的家庭教師，這是他與中國發生淵源的開始。1909年應母校東京帝大之聘回國任職。1910年奉派到歐洲留學。1913年學成歸國，仍回母校擔任教職。1914年因同僚寺尾享懇請，參與專門培養中國革命黨幹部「政法學校」的教學工作，這使他有許多機會與革命志士來往，其中也包括孫中山。1916年年初，他著手撰寫中國革命史，介紹革命黨的理想。吉野以其本身的學術基礎，再加上與中國南北政要都曾有接觸，因而他的中國研究，頗有獨到之處。同年1月，他發表「試論憲政之本義及達成憲政目的的途徑」一文，展開他在日本鼓吹民主運動的生涯。往後的歲月，他不斷為文批評日本的專制政治，介紹民主理論，提倡廢除選舉資格。此時，適逢日本大正時期(1912-1926)，世人鑑於他對推展日本民主運動化的貢獻，稱譽他為「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先驅」。1924年1月，辭東京帝大教職，入朝日新聞社擔任主筆，旋即因言行觸犯日本政府當局，而被迫去職。於同年7月，仍回母校東京帝大任教。1926年，參與「社會民眾黨」的組黨工作，期待新政黨的成立，能促進日本政治的民主化。但不料一手所培養的政黨，竟為擴張黨勢犧牲建黨理念，而採用與右翼軍人合作的政策。為此，吉野與社會民眾黨劃清界線。1932年，發表「民族與階級與戰爭」一文，除了力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之不當外，也抨擊社會民眾黨坐視政府侵華政策的不義。翌年，逝世於神奈川縣。

②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とその後(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年)，頁24-42，155-156。

③ 松尾尊允曾將吉野作造生前針對中國及韓國問題所發表的論文，彙編成一本書，題為「中國・朝鮮論」，並為此書寫了近兩萬餘字的「解說」，松尾尊允編，中國・朝鮮論(東京，平凡社，1970年)。針對吉野的中國觀而撰寫的論文有野原四郎，「民本主義者の孫文像」，論集日本歴史刊行會編，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有精堂出版株式會社，1977年)，頁234-242；宮本又久，「帝國主義としての民本主義—吉野作造の對中國政策」，日本史研究，1967年第91號，頁33-52。針對中日關係而論及到吉野觀點的論文有野原四郎，「五四運動と日本人」，中國研究所紀要第2號(1963年10月)，頁88-95，111-116；林明德，「日本與五四」，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民國68年)，頁99-101，108；嶋本信子，「五四運動と日本人：同時代の反應と研究史」，史潮，1967年第100號，頁224-225；安藤久美子，「同時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辛亥革命觀：吉野作造と北一輝を中心として」，史潮，1967年第100號，頁233-235；樂炳南，「濟南事變之真相」，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24編護法與北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頁815-816；拙文，「吉野作造と中國：五四運動を中心に」，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院法學研究科論文集，第22號(1985年)，頁81-100。探討吉野與中國的關係而收錄於專刊者有田中惣五郎，吉野作造：日本のデモクラシーの使徒(東京，三一書房，1971年)，頁85-105；松尾尊允，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66年)，頁292-306；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とその後，頁188-195。

絕大部份的研究，都偏重在介紹他與中國的淵源，他的中國觀或是他對某一特定時局的看法，專門分析他的中國觀之形成與變遷的著作很少。^④至於以研究他與中國革命的關係為主題者，更屬罕見。本文有鑑於此，遂將研究焦點置於早期的吉野為何對中國革命持反對態度，後來又為何持肯定態度，並循吉野對孫中山認識深淺此一線索，分析他的中國革命觀之形成與變遷間之相互關係。至於吉野個人在日本輿論界的崛起與沒落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所居地位之重要及影響之深遠，另撰專文探討。

二、否定中國革命的由來

吉野作造與中國的淵源始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一月，他是以前直隸總督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師身分應聘到中國。在這之前，他與中國人素無交往，對中國事務也無特殊研究。根據他的自述，他應聘到中國，完全是基於經濟因素。^⑤光緒三十年（1904）吉野作造以「特優生」^⑥的成績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按照往例，吉野作造應以東京帝大教授候補者的身分，被派往歐美留學。^⑦但適逢日俄戰爭，受日本政府緊縮教育經費的影響，吉野雖有資格，卻不能如願以償。而其本人又一心執意於學術，無意就職他業，因此只好託身於研究所等待教學機會。^⑧他的中國之旅，就是在日本苦無就業機會，而本身又有家累的狀況下成行的。^⑨吉野在中國待了三年，第一年他專任袁克定的行政法老師，爾後出任直隸總督督練處的翻譯官，並在督練處講授國際法。辛亥革命時期以清軍第二十鎮統制名義領銜要求立憲而名噪一時，爾後又出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張紹曾就是此刻吉野的學生。^⑩光緒三十三年（1907）九月，他轉任北洋法政學堂，教授有關議會政治與地方自治的課程。^⑪中國共產黨創始者之一的李大釗，也曾於此時受教於吉野。^⑫

三年的旅華期間，除一度隨袁克定到過瀋陽外，他的足跡都未超過天津地區。

④ 例如松尾尊允以吉野自身所提倡的「民本主義」的觀點來解析吉野對五四運動的看法。宮本又久以階級意識的觀點來分析吉野的中國論中所帶涵的帝國主義色彩。松尾尊允，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頁295；宮本又久，「帝國主義としての民本主義：吉野作造の對中國政策」，頁33-51。

⑤ 吉野作造，「あの時、あの人」，經濟未來，1932年2月，頁112。

⑥ 田中惣五郎，吉野作造：日本のデモクラシーの使徒，頁82。

⑦ 吉野俊造，「編纂後記」，吉野作造，日華國交論（東京，新紀元社，1947年），頁295。

⑧ 田中惣五郎，吉野作造：日本のデモクラシーの使徒，頁82。

⑨ 此時吉野作造已是三個女兒的父親。

⑩ 同註⑤，頁119。

⑪ 今井嘉幸，「支那時代の吉野君」，赤松克磨編，故吉野博士を語る（東京，中央公論社，1934年），頁1。

⑫ 同註②，頁189。

⑬ 在這段時期他寫了不少文章，介紹中國的風土人情，憲政改革的現況⑭ 以及天津所試行的地方自治。⑮ 文章中，他談到對革命黨的看法。他認為革命黨並不是一個真要推翻現行政治制度的革命團體，而僅僅是一羣激憤於官僚的腐化或者嫉妒官僚權勢的在野勢力，這個團體不但沒有一定的主義，也沒有既定的理念。因而只要清廷政府對這些革命黨人稍加安撫，授與一官半職，革命黨人也會立即成為現行體制的熱心擁護者，他認為革命黨雖然人多勢眾，但為權勢利誘出賣革命黨的黨徒也不少。因此，吉野斷言中國的革命時機尚未成熟。⑯ 從以上吉野的言論，可得知他對革命黨人並未持有良好印象，更不認為革命黨有推翻清廷政府的實力。

在其他的文章裏，吉野也坦承他對中國的失望。在他眼裏，中國警察與匪徒的差異，只是在外觀的差別。⑰ 中國官吏公開接受賄賂的習俗讓他訝異。⑱ 除了中國商人重信用講求誠實的作風令他讚賞不已外，⑲ 中國無一是處。而清廷政府的立憲改革，也不過是舊酒換新瓶，模倣日本及西方國家一些典章文物制度的皮毛，而忽略掌握近代西方文明的實質精神。再說中國的行政官吏，都是現行政治體制下的受益者，他們不熱衷改革，只會虛應故事。⑳ 在此，吉野對立憲改革成效表示懷疑。

宣統元年（1909）一月，吉野作造應其母校東京帝大之聘回國任職，三年的旅華生涯，對他來說是不堪回首。尤其是抵華初期，袁克定不履行契約，半年沒有發給薪餉，更令他憤憤不平。㉑ 事後他在回憶中也強調，三年內沒有交到一知心的中國朋友，對中國失望有加，怒斥中國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㉒ 而使他重燃對研究中國問題發生興趣是在宣統二年（1910）他奉派出國留學歐洲之時。吉野是一虔誠的基督教徒，留歐三年中，㉓ 他常往返於當地的基督教青年會，在教會裏，他常聽

⑬ 吉野作造，「清國の夏」，新人，1909年8月，頁37。

⑭ 吉野作造，「支那人の形式主義（再び）」，新人，1906年9月，頁14-15。

⑮ 吉野作造，「天津における自治制施行の現況」，國家學會雜誌，1907年6月1日，頁738-811。

⑯ 同註⑭，頁16。

⑰ 吉野作造，「支那觀光錄（第二信）」，新人，1906年5月，頁28。

⑱ 吉野作造，「支那觀光錄」，新人，1906年4月，頁35。

⑲ 同註⑰。

⑳ 同註⑭，頁15-18。

㉑ 根據吉野的解釋，袁克定以往的外籍老師都是從直隸總督府借調，老師薪餉自然也由直隸總督府挾付。吉野雖由袁氏本人聘請，但袁氏仍舊希望由總督府支付薪餉。但因為總督府一時無空缺，吉野的薪餉也就一直無下聞。由於雙方事先交涉時，曾明言由袁氏本人聘請，因此吉野認為袁氏背信。同註⑤，頁112-119。

㉒ 吉野作造，「支那問題について」，松尾尊允編，中國・朝鮮論，頁199。

㉓ 第一年吉野在德國海德堡大學研究，爾後他遊學於柏林與維也納之間。第三年他轉往法國，曾短暫學習法語，但大部分時間還是偏重於探訪各地民情風俗及名勝古蹟。留歐三年期滿後，他取道英美返日本。

到王正廷的事蹟。王正廷時任基督教青年會年度大會的中國代表，他的表現得到每一位與會者的激賞。而這些有關對王正廷的讚譽令吉野心儀不已，使得曾經斷言「中國沒有人物」的吉野，深感覺得對中國應有再研究的必要。^②

民國二年（1913）七月，吉野回日本。當他得知王正廷已加入討袁陣營，且參與二次革命，這使對革命黨抱有成見的吉野訝異不已，引起他研究革命黨的熱忱。根據他的自述，民國三年初，與流亡日本的中國革命志士的來往，是他正式踏入研究中國國民運動問題領域的第一步。^③但在回憶錄裏，他對此事只是一筆帶過，沒有詳加解釋。換言之，他並沒有提到他究竟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和怎麼樣的革命黨人士來往，以及這類的交往給了他何種的影響。對於以上諸問題，坊間所出版有關吉野作造的傳記、研究論文等，至今也仍然沒有交代。而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珍藏的「清末民初中國流亡日本革命志士監視記錄」裏，卻對此刻吉野作造的活動有部份記載。

眾所周知，二次革命是發生在民國二年七月，但旋即被袁世凱鎮壓。爲了逃避袁氏的追緝，很多革命志士於同年八月起先後流亡到日本。其中除孫中山、黃興、胡漢民、李烈鈞等重要幹部外，也有很多基層黨員追隨而去。爲了照顧他們的生活以及培養革命黨再起的勢力，黃興動用了李烈鈞所帶來的十餘萬元，作爲基金，創辦了培養軍事幹部爲目的之浩然廬及以訓練行政人才爲宗旨的政法學校。^④浩然廬是委請前日本陸軍上尉青柳勝重負責，而政法學校則由東京帝大教授寺尾亨主持。吉野作造則自民國三年二月起，在這所政法學校擔任「政治史」的教學。該校有一八〇名學生，所有學生不是革命黨員就是他們的家屬，可謂是黨校。校址借設於東京工科大學內，授課的教師如東京帝大的小野塚喜平次、慶應義塾大學的堀江歸一、早稻田大學的本多淺治郎等人，都是一時之選。^⑤雖然參與政法學校的日本名人不少，但至今還沒有發現有關政法學校的更具體日文史料。或許是這學校的特殊性質，使得參與者都有所顧忌。不過，依「革命志士監視記錄」裏的有關政法學校

^② 同註②，頁199-200。

^③ 同註②，頁200。

^④ 李烈鈞，李烈鈞自傳，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7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0年），頁32；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62年），頁362-363。

^⑤ 政法學校的教授都是以其專長授課，小野塚喜平次教政治學，堀江歸一教財政原論，本多淺治郎教西洋史。此外，還有野村淳治、渡部信教比較憲法，島村他三郎教行政汎論，小林丑三郎教經濟原論，中村進午教法學通論，乾政彥教民法總論，寺尾亨教國際公法。「警秘閣第二三四號」（1914年4月17日），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亡命者を含む），第11卷，外交史料館藏，原件。以上資料是尚未出版的史料，簡稱「外務省記錄・革命黨關係」。

的記載，足以證實吉野作造與革命志士的來往，是始於參與這學校的教學工作。雖然，在吉野作造的回憶錄裏，也從未提及與孫中山有面謁之緣，但在孫中山的監視記錄裏，卻很明確的記載他與孫中山有交往的事實。^{②⑧}總而言之，民國三年初吉野與革命黨人的交往，是促使他開始研究中國國民革命問題的關鍵所在；但閱讀當時他對中國問題所發表的論文，可知道他對革命黨仍未持有客觀的評價。這可從其對二十一條約及洪憲帝制問題的意見中得到證實。

民國四年（1915）一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欲將中國置於日本保護國的地位。對於日本政府的這項政策，吉野是全力支持。他強調由於日本人口的成長與經濟的發展，日本勢必要走向對外擴張的道路，而從任何角度來看中國都是日本擴展其生存空間的重要地區，因而日本不能袖手旁觀中國任意被西洋列強宰割的局面。^{②⑨}換言之，鑑於中國無望於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西方列強又競相在中國劃分地盤，建立排他性的勢力範圍，在這情況下，日本為求確保其發展空間，只得參與競賽，力謀在中國建立自己的地盤。^{③⑩}吉野就在為求確保發展空間，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政策認為應給與合理化。所以在這前提下，他肯定了二十一條要求的合理性。由於他對二十一條要求寄望殷切，因此，對交涉的成果也異常不滿。他為此特地出版了一本「日支交涉論」，詳述了其對二十一條要求的看法。他強調所有的要求，都是「最低限度」。^{③⑪}尤其是第五號款，認為日本之原意無非想在經濟、軍事、文化上能與中國進一步合作，圖謀兩國共同利益。因此，日本實不應因英國的牽制及中國一時的反對而有所退讓。而其在宣揚第五號款有促進兩國實質共同利益時，有一段涉及革命黨。

日本在二十一條中的第五號第四條，要求中國向日本採購一定數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置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吉野坦承此項要求是著眼於提高日本國內兵工廠的經濟效益，進而謀求武器製造技術的提昇。^{③⑫}但他卻不認為此項合作關係僅是日本單方面受益，而強調是基於雙方的互惠，他指陳：

從任何角度來看，中國向遙遠的歐洲購買武器都不如從近鄰日本取得方便。

②⑧ 「孫逸仙卜帝國大學教授集合ノ件」（1915年6月5日），同上，第17卷，乙秘第1261號，原件。

②⑨ 吉野作造，日支交涉論（東京，警醒社書店，1915年），頁232-233。

③⑩ 同上，頁228。

③⑪ 同上，頁255。

③⑫ 同上，頁204-205。

國內革命黨叛亂，需用兵增購軍火之際，從德國購買需花四、五十天才能運到。而如由日本供應，五至七日就可到達。反正中國需要由外國供應軍火，爲何要捨近求遠。^③

從此段說詞，可知在吉野的眼中，革命黨只是一顆隨時可供犧牲的棋子。雖然在他的回憶中，一再強調民國三年初與革命志士的交往，是他踏入研究中國革命領域的契機。但從當時他一再斷言中國無望於獨立自主，並進而將革命黨作爲中日交涉中，日本政府的一項籌碼來看，法政學校的教學經驗，並未促成他認清革命黨的反袁實力，更未促使他對革命黨的理想產生共鳴。

二十一條交涉剛告一段落，洪憲帝制問題立即成爲中日外交關係上的緊張課題。在帝制問題醞釀的初期，日本政府明持觀望態度，暗留干涉餘地。^④一旦帝制問題白熱化之後，日本則又公然持反對態度，並於民國四年（1915）十、十二月間，兩度聯合英、俄等國勸告袁氏延緩變更國體的計畫。對於洪憲帝制之事，吉野也表達了極度的關切，前後發表了五篇時論，^⑤論及此事。並列舉以下理由，力評日本干涉中國帝制問題的不當。

- 一、干涉理論根據過於脆弱。日本政府干涉中國變更國體的理由是袁氏如擅改帝制，將會導致中國國內動亂，進而影響遠東和平，日本政府的一切顧慮雖爲維護遠東地區的秩序，但是吉野卻認爲依袁氏在中國的實力，日本政府所指陳一切都是虛構之詞。換言之，吉野認定袁氏有能力掌握中國情勢，即使他一心執意登基，也不會造成動亂。因此，日本政府所列舉的干涉理由，都不足以服人。
- 二、干涉的時機不對。日本政府如執意要反對中國實施帝制，就應在帝制醞釀的階段表態，不應等問題白熱化之後，才落井下石，此刻對袁氏來說，已是覆水難收，日本政府的要求無非是強人所難。
- 三、干涉的成效不大。吉野認爲實施洪憲帝制不僅只是袁氏個人及其家族、親信等人的想法，也代表了北洋官僚體系的願望。這涉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中國官場文化。袁氏個人的境遇關係到整個北洋官僚體系的命運。

^③ 同上，頁217-218。

^④ 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民國73年），頁96。

^⑤ 參閱吉野作造，「支那帝制問題的批判」，新人，1915年10月；古川學人（吉野作造——著者註，以下同），「支那の帝制は實現の見込ありや」及「支那帝制實現の結果如何」，中央公論，1915年10月；古川學人，「支那帝政問題に對する我國の態度」，中央公論，1915年11月；吉野作造，「支那帝制問題」，外交時報，1915年12月。

各地區的行政官僚熱衷推動帝制活動也是寄望袁氏地位世襲化更有助於自身權勢的保障。因此，僅從袁氏個人下手，希望透過施壓而讓其改變心意的作法，是輕估了中國官僚體系推動帝制的決心。換言之，吉野認為即使袁氏有意退讓，他底下的官僚們也不見得就會願意罷手。因此，吉野對日本的勸助成效表示懷疑。³⁶

如上所述，吉野對洪憲帝制問題的看法是「就事論事」，並沒有掌握到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精髓，誠如林明德所云，當時日本對華政策就是「欲擒故縱」。³⁷即帝制醞釀初期，日本政府經由總理大臣大隈重信發言的方式，表達了「贊助之語」，³⁸誘導袁氏推動帝制。但在帝制進入緊鑼密鼓之時，卻又公然勸阻。目的就是要逼袁氏進入兩難之地。爾後，護國軍軍興，更是公然支持所有反袁力量，企圖趁機推翻袁世凱。³⁹總而言之，從當時吉野的言論，可知他並沒有預料護國軍會崛起。在他強調即使袁氏登基中國也不致釀成大亂之時，他也對包含革命黨在內的所有反袁勢力可能的動向作了以下的分析：

袁氏如決定登基，則一定會導致動亂嗎？當然，對藏之於在野的反袁勢力而言，袁氏的登基，意味著他們永無再起之日。形勢如此逼人，他們也只好鋌而走險。既然走險，自然也不會顧忌手段激烈與否。但是採取激烈手段的抗爭也象徵著此種對抗絕不可能有成氣候之時。在野勢力在面臨永無再起的恐懼之時，部份人會鋌而走險，但相對的也有一部份人會趨向軟化走向妥協之路，進而投身袁營之事也是可預見的。總之，反袁登基的浪潮是雷聲大雨點小，不足為慮。⁴⁰

從以上吉野對反袁勢力的評估，可知他不但未預測到護國軍會軍興，也未預料到袁氏會因此而垮臺。他對革命運動仍抱持輕視的態度，而他對革命勢力觀感的改變，是在護國軍崛起之後。

三、對中國革命觀改變的肇因

民國四年（1915）十二月二十五日，護國軍在雲南起義，揚起反袁的旗幟。對

³⁶ 吉野作造，「支那帝政問題」，頁18-28。

³⁷ 同註³⁶。

³⁸ 同註³⁶，頁94-95。

³⁹ 林明德，「日本與洪憲帝制」，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四輯（臺北，聯經出版社，民國69年），頁234-251。

⁴⁰ 古川學人，「支那帝政問題に對する我國の態度」，頁73。

堅信袁能掌握全局，反袁勢力不足為慮的吉野而言，可謂一記當頭棒喝。吉野開始修正他的看法。此舉首先反映在民國五年（1916）二月他所撰寫的時論上。他檢討以往所堅持之己見，肯定早期日本政府的勸阻帝制政策是有必要。但他對中國未來可能產生的演變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推測，只一再呼籲日本政府應該嚴守中立，靜待中國政壇自然發展。^④此一時論透露出吉野個人對中國政局的迷惑，而這也是他在過去發表的時論中少見的沒有既定立場的一篇。

護國軍雖然在軍事上沒有重大突破，但在聲勢上卻日有進展。民國五年三月，吉野的中國評論也反映了此一演變，對革命運動重新予以評價。他仍然肯定在軍事及財力上袁氏有鎮壓護國軍的能力，但卻指陳「革命不僅是武力的戰爭，也是思想上的戰爭，只要這革命的思想不被磨滅，支那終究會是青年支那黨的天下。」^⑤當時，吉野創造了「青年支那黨」這名詞，來稱呼以護國軍為主體的反袁勢力。如何辨認舊國民黨與立憲派的關係，對吉野而言，是有認知上的困難。他以曾留學日本，而期待以革命的方式來改革中國既有的弊端而結合的反袁青年組織，^⑥作為認知的標準。他不用「革命黨」的名詞，是因他不欲與「中華革命黨」相混淆。基本上，他認為雲南起義事件上，與中華革命黨沒有任何直接關連。^⑦

光緒三十二年（1906）吉野在天津曾評稱，「革命黨是一羣沒有主義沒有理念，只是基於激憤或嫉妒官僚權勢的在野勢力。」^⑧而此時此刻他卻肯定護國軍是一有理念有思想的革命勢力，由此可知護國軍的反袁可以說是他對中國革命運動觀感改變的一大轉捩點。由於他開始認定國民革命運動是有一崇高理念的改革運動，因此他也開始相信中國革命運動的未來性。雖然他對革命勢力日趨肯定，但如何確保日本在中國的特殊權益仍是他關心的主要課題。他一面呼籲日本政治家在考慮對華政策時，不要輕視革命勢力在中國政治舞臺的未來性；另一面也強調政治不應忽略現實，認為袁氏仍是強人，日本不應和他交惡。他認為理想的對華政策是「右手與青年黨保持某種程度的接觸，左手仍與袁世凱一起共事。」^⑨

④ 吉野作造，「支那帝政問題の前途如何」，中央公論，1916年2月，頁15。又參閱古川學人，「南支那の動亂」，中央公論，1916年2月，頁35。

⑤ 吉野作造，「對支外交根本策の決定に關する日本政客の昏迷」，中央公論，1916年3月，頁84。

⑥ 同上。

⑦ 古川學人，「袁總統の逝去と支那最近の政局」，中央公論，1916年7月，頁82。

⑧ 同註④，頁16。

⑨ 同註④，頁84-86。此種以現實利益為依歸，鼓吹兩面外交的論調，並不是吉野個人的創新之見；早在辛亥革命時期，時任內務大臣的原敬，就持此見解，力促日本政府向清廷及革命黨兩面示好。這也是辛亥革命以來，日本政府對中國內爭所持的基本政策。「原敬日記」（1911年10月20日），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四卷（東京，乾元社，1951年）。及參閱犬養毅，「日本と次の戦争」，第三帝國，第33號，1915年2月25日，頁5。

民國五年五月八日，護國軍成立了軍務院，使已宣告獨立的五省有一統籌機構，更鞏固了反袁陣營的團結。而這之前袁世凱雖已於同年三月二十二日宣佈放棄帝制，但仍不肯放棄政權。兩大陣營仍處於僵持狀態。此時，馮國璋則力倡「南京會議」，企圖以第三者身分主導政壇。面對中國日益紛亂的局面，吉野也適時表達了他的關心。他首先力斥當時日本輿論界興起的「干涉中國論」，⁴⁷他指陳中國的現狀並非如輿論界所述已陷入權力中空。雖然他不否認軍務院、袁世凱、馮國璋都無力控制全局，但卻強調軍務院最得人心，前景最被看好，因此他反對日本趁三派的實力都在伯仲之間時，應趁虛而入的說法。在民國五年六月所發表的時論中，他第一次公開表達了他支持軍務院的立場，⁴⁸這是他支持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起點。

在六月的時論中，他又開始起用了「革命黨」的名詞來稱呼護國軍。依其解釋，雲南的起義，不是一突發事件，而是革命同志在二次革命後就著手籌劃的成果。一手籌措策劃雲南起義的這些革命黨人，既和孫中山無關係，也非十年、二十年前世人眼中的革命黨人。吉野認為，十年、二十年前的革命黨人，都屬孫中山派系的人物，是一羣憧憬法國革命、美國式民主政治的理想家，是一些沈醉於共和主義、民主主義等抽象理論的革命家。但今日的革命黨人，卻都是一些熱血愛國青年。他們都曾有留學經驗，尤以留日者居多，他們參與革命，是因憤慨祖國的落伍。換言之，他們是因目睹先進國家進步，痛感祖國改革的必要，而投身革命者。吉野坦承這些革命青年，雖有急於打破舊有制度，而疏於研究復國建國計畫的缺點，但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的愛國至誠，卻是令人激賞。吉野毫不諱言，他個人也是因激賞他們這份愛國熱誠轉而支持革命黨。⁴⁹文中他用新舊革命黨的名詞來劃分護國軍與孫中山的關係。此一創舉無非是希望用新的名詞來詮釋雲南起義事件中類似蔡鍔、唐繼堯等人所扮演的角色。另一面，他反覆強調新舊革命黨之別，也意味著吉野不欲孫中山的形象影響世人對革命黨的看法。因這涉及他個人對孫中山的評價，也關係到當時日人對孫中山的一般觀感。吉野認為孫中山是一位重理想輕實務的人，個性剛愎自負，難與人共事。而孫中山對推展共和政治的執著，又勝於他對中華民族的熱愛。在吉野的眼中，他是一位「世界主義者」，他為了追求能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從不避諱向外國求援，只要有助於他推展民主政治的大業，犧牲民族利益也在

⁴⁷ 吉野作造，「支那政局私見」，外交時報，1916年6月1日，頁18-22。

⁴⁸ 同上，頁20-36。

⁴⁹ 同上，頁24-32。

所不惜。吉野特舉出光緒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義事件上，孫中山為得到臺灣總督的支持，輕諾割讓廈門之事，來說明孫中山的為人處事。^{⑤①}這是不欣賞孫中山的原因，也是他一再反覆強調新舊革命黨之分的原因。而文中，評孫中山為重理想而輕實務之語，也可視為當時一般日人對孫的普遍印象。^{⑤②}

根據吉野的自述，他是在雲南起義後不久，接受委託而正式開始研究中國革命運動史。而懇請者是熱心支援中國革命運動的右翼社團玄洋社創始人頭山滿及法政學校校長寺尾享，他們希望吉野趁護國軍崛起之際，能將中國的革命精神、革命運動發展的來龍去脈，廣向日人介紹。寺尾還特地商請了戴季陶、殷汝耕來協助吉野撰稿。^{⑤③}吉野從民國五年（1916）十一月起至民國六年七月止，連續在日本「國家學會雜誌」撰文介紹中國的革命運動。爾後，民國六年的六月，他將這些文章加以整理後，輯成專書，名為「支那革命小史」。^{⑤④}吉野生平頗自負於他的中國革命史研究，他自稱他所撰寫的所有內容都是根據第一手史料，不是直接耳聞於當事者，就是閱讀當事者所寫的報告。^{⑤⑤}如細察吉野與革命運動的淵源，可知此言不虛。吉野除孫中山外，^{⑤⑥}也曾與黃興交往。^{⑤⑦}撰稿時除得到戴季陶、殷汝耕兩位革命黨對日交涉要角的支持外，也得到與革命運動有深厚淵源北一輝^{⑤⑧}的諄言及宮崎滔天^{⑤⑨}等人的協助，再加以吉野在法政學校與革命黨員接觸的經驗，^{⑥①}他的研究自然有其可取之處。而這些研究也奠定了他研究中國問題的基礎，爾後他又陸續寫了兩本有關中國問題的書（第三革命の支那・對支問題），及與他人共著了一本「支那革命史」。^{⑥②}這些研究使他一躍為當時最引人注目的中國問題專家。

⑤① 吉野作造，「支那第一革命ヨリ第三革命マデ（一）」，國家學會雜誌，1916年11月，頁34-35。又參閱吉野作造，中國革命史論（東京，新紀元社，1947年），頁22。

⑤② 護國軍軍興之後，日本參謀本部曾針對各反袁勢力之間的相互關係作了一份研究報告。戴季陶、許崇智、陳其美、居正、張人傑、汪精衛、胡漢民等人被列為孫派。該報告指稱這一派集理想家之大成，欠缺良好的執行事務之能力。「革命黨所在地及人物短評」（1916年3月13日），外務省記錄・革命黨關係，第18卷，秘受2707號，原件。

⑤③ 吉野作造，「『三十三年の夢』解題」，收入吉野作造，講學余談（東京，文化生活研究會，1927年），頁155。

⑤④ 吉野作造，支那革命小史（日本，万葉書房，1917年）。

⑤⑤ 吉野作造，「評論家としての自分並佐佐政一先生のこと」，講學余談，頁318。

⑤⑥ 同註⑤④。

⑤⑦ 同註⑤④，頁156。

⑤⑧ 同註⑤④，頁320。北一輝於光緒32年（1906）起參與「革命評論」雜誌的編輯工作，專門向日人介紹中國革命，他本人是宋教仁摯友，曾於民國10年（1921）出版「支那革命外史」。

⑤⑨ 同註⑤④。光緒23年（1897）起，因接受宮崎滔天勸告，孫中山以日本作為革命黨的活動基地。光緒33年（1907）孫中山被迫離開日本之後，宮崎是孫在日本全權代表。由以上的事實，可知宮崎與中國革命關係的淵源。

⑥① 同註⑤④。

⑥② 參閱吉野作造，第三革命の支那（東京，內外出版社，1921年）；吉野作造，對支問題（東京，日本評論社，1930年）；吉野作造、加藤繁，支那革命史（東京，內外出版社，1922年）。

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逝世，護國軍之役因袁氏逝世而結束。南北雙方則在恢復舊約法及國會的前提下，達成和解，中國再度統一。統一後的中國，因南北雙方基本理念的差異，政爭仍繼續不斷。唐紹儀不能順利就任外交總長，以及內務總長孫洪伊與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之間的「府院衝突」，都是這種南北勢力對抗的反映。吉野稱呼這種對抗是「革命主義者與軍閥官僚的抗爭，進步改革派與現狀維持派的抗爭」，^①他認為南方的改革派如能假以時日，必能獲最終勝利。但鑑於以段祺瑞為首的軍閥官僚在北方根基雄厚，反之南方改革派卻欠缺行政上的實務經驗，在這種現實情況下，認為改革派仍難在短期內有主導政權的可能。吉野強調中國首要之急無非是要建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為中國之計，南方改革派應居主導之地位。換言之，吉野支持改革派的政見，並以改革派的支持者自居。此外，他也強調改革派的多數政要，不是曾留學日本，就是曾接受日本援助，與日本有深厚淵源，因此，他認為改革派的日漸興起，有助於中日交流，是日本在中國謀求發展的絕好時機。他呼籲日本朝野要痛省以往在中國的各種失敗，要好好珍惜改革派興起所帶來的轉機。^②這篇時論完稿於寺內內閣（1916年10月9日）誕生後的一個多月（11月16日）。雖然文中沒有提到新內閣之語，但依時間推斷，吉野文中對日本朝野的呼籲似乎也可視為對新內閣的一種期許。

如前述，寺內內閣於民國五年十月成立，新內閣雖然強調尊重中國主權，要修正往日大隈內閣的侵略作風，但其基本策略上仍是如何鞏固日本在華的優越地位。^③此時期醞釀的參戰問題，可謂寺內內閣對華交涉的絕好籌碼，也是促成寺內與段派接合的一大主因。吉野對寺內採取親北方而疏南方的外交政策，深表不滿，吉野一再表示，段氏在形式上雖代表中央政府，但實質上只是軍閥官僚的代表。^④如寺內執意只與段氏打交道，無非意味著日本的對華政策只在於滿足中國的一些舊有勢力。中國的軍閥官僚以國家利益為重者寡，以個人利益為主者眾，得民心者應該是改革派人士，如要謀求中日百年親善大計，日本應多與南方改革派接近。在此，吉野強調在中國之西方人，尤其是英國人支持段氏最力，起因於英人忌諱南方改革派人士與日本的深厚淵源。換言之，英人認為改革派的得勢，將象徵著日本勢力在華

① 吉野作造，「支那最近の政局」，東方時論，1916年12月，頁2。

② 同上，頁2-3，15-17。

③ 林明德，「簡論日本寺內內閣之對華政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23編，民初外交（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5年），頁524-525。

④ 古川學人，「現內閣の所謂對支政策の刷新」，中央公論，1917年2月，頁81。

的全面優勢。改革派人士不得英人支持實肇因於此。日本政府實不應受西方列強影響，應珍惜與改革派人士的既往友誼，協助改革派重建中國才是。⁶⁵

民國六年（1917）三月十四日，中國宣佈與德絕交，此乃段氏為首的北洋政府一手主導的政策，也是日本政府與英法等國達成協議後欣而樂見的目標。⁶⁶吉野對中國準備參戰之舉持否定的態度。他指陳以一參戰同盟國的日本人身分，對段氏之舉不得不表達感謝之意，但如以中國國民的立場來看，中國斷無冒然加入戰場之理由，因為中國遠離歐洲戰場，並不因此次戰爭而蒙受直接的損傷，雖然參戰能獲些小益，但參戰本身所帶來的影響反而是內政重於外交。⁶⁷顯而易見，參戰涉及中國兩大派的勢力消長。⁶⁸吉野當時認同南方的看法，認為段氏此舉無非是趁機獲取外援，好鞏固自身地盤。段氏一旦取得外援，必定會壓制國內反對勢力。⁶⁹從吉野當時的言論已可看出，他已跳出僅從日本立場看中國問題的框框，而能秉持公正立場，來看中日兩國問題。他之所以有這樣見解，當然和其堅信中國必賴南方改革派革新才有希望獨立自主有關。換言之，吉野認為中國的獨立自主有賴於南方改革派的執政。日本一味援助北方官僚壓抑南方勢力成長的政策，不但防礙中國求進步，同時也結怨於南方改革派。這也是他一再呼籲寺內內閣重估對華政策的原因。當時在吉野筆下的南方，並非有一嚴格規範定義。而是泛指原軍務院統轄下的西南各省，孫中山、唐紹儀等在野名流及以張繼等為首的國會議員等。⁷⁰

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張勳復辟。吉野七月七日就撰稿斷言張勳必敗。吉野強調推展共和政治已是中國民眾之共識，復辟之舉是逆潮流開倒車的作法，失敗為當然之事。但他也坦承即使復辟失敗，中國仍跳不出南北對抗的基本模式，中國仍無法立即享有健全的共和體制。⁷¹誠如吉野所預料，復辟只維持了十二天，七月十四日，段祺瑞入京視事，翌日再度組閣，中國仍走向南北對抗的局面。對段氏的再度組閣，吉野強烈的表達了他個人的不安。他指陳段氏與張勳都是一丘之貉，兩者的差距只是在於擁護的體制不同，至於渴望掌權，嚮往專制政治的本質卻是一致的。

⁶⁵ 吉野作造，「對支政策に對する疑問」，東方時論，1917年3月，頁9-17。

⁶⁶ 日本政府原本反對中國參戰，唯恐中國利用參戰來擺脫日本的控制。但民國6年（1917）年初，日本與英法俄義等國達成協議，列國保證和會期間支持日本取得山東之利權，此後日本為維護此等利益，開始積極慫恿中國參戰。同註⁶⁵，頁523-526。

⁶⁷ 吉野作造，「支那政府の對獨外交を評す」，東方時論，1917年4月，頁13-16。

⁶⁸ 吉野作造，「動搖常なき支那政局の前途」，東方時論，1917年6月，頁22。

⁶⁹ 吉野作造，「最近支那政界の二大勢力（承前）」，外交時報，1917年7月15日，頁55。

⁷⁰ 同註⁶⁷，頁25。參閱註⁶⁵，頁13-15。又參閱註⁶⁸，頁25。

⁷¹ 同註⁶⁹，頁64-67。

⑳ 這點也正如吉野的判斷，段祺瑞本無意推展民主共和政治，更遑論重開國會。

鑑於此，孫中山於同年九月一日，在廣州組織軍政府，倡導護法以護國體，中國又告分裂。對南北分立之局，吉野深表關心。他指陳中國名義上是南北分裂，實際上是段祺瑞派、馮國璋派、孫中山派三派的鼎立，三派都無力一統中國，因此三派應謀求妥協。吉野建議日本政府應立即斷絕對北方政府的任何援助，並在尊重法治及國會的精神下誘導三派達成妥協。從吉野的建議，得知他比較支持南方的軍政府。不過他理想的領導人物，卻非孫中山，他建議日本政府應從北方政府中找尋一位能理解軍政府主張、贊成法治主義的政治人物來收拾殘局。此時，吉野仍不改其對孫中山領導才能的懷疑。套用他的話「贊成孫中山意見者，未必願與孫中山共事。」㉑

段祺瑞平定復辟，挾「再造共和」之功再度組閣之後，寺內內閣的正式援段政策也緊接成立，自此，「西原借款」源源不絕。段氏運用此筆外援，實行其武力討伐南方的政策。對中國陷於內戰，吉野深表不安，他直言中國之陷入內戰，日本不能推卸責任。㉒日本供應武器給段氏，是阻礙中國南北言和的要因。對寺內內閣與段內閣之間簽訂的「中日軍事協定」，吉野也極表不滿。吉野認為不待中國統一，就與段內閣簽約，無疑表達日本政府對段氏政權的偏袒，也意味著日本政府支持段氏的武力統一政策。㉓而事實上，段氏的武力政策成效有限，此事可從北方將領的態度上得到證實。如前方將領按兵不動，反而利用「中日軍事協定」攻擊段氏不當之舉，在在顯示段氏的武力政策不得人心。因此，吉野斷言日本政府寄望援助段氏，而圖謀鞏固日本在華權益之舉，無非是緣木求魚。㉔

民國七年（1918）五月，孫中山辭軍政府大元帥職，孫中山的辭職乃是因受非常國會政學會派的議員與西南地方軍閥的排擠。軍政府排斥孫中山，是因他被視為南北和議的障礙。對孫的去職，吉野頗表不平，他撰文稱，如果說中國還有忠於主義的政治家，那就非孫中山莫屬，在遵守信念擇善固執這點上，中國沒有任何政治家可與孫匹敵。孫中山之所以被視為南北和談障礙，也始因於其堅守主義拒絕妥協的個性。但吉野認為孫是南北和談障礙的說法有欠公道，吉野指陳南北和議的障礙

㉑ 吉野作造，「復辟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觀たる支那最近の政局」，東方時論，1917年8月，頁4-6。

㉒ 吉野作造，「支那最近の政局」，東方時論，1917年10月，頁23-35。

㉓ 吉野作造，「支那政局最近の變調と日本の態度」，東方時論，1918年5月，頁39。

㉔ 吉野作造，「軍事協約は日支兩國に何ものを與ふるか」，東方時論，1918年6月，頁50。

㉕ 同上，頁50-53。

莫過於「雙方爭的是利益而非主義，爭的是誰出掌政權而非國家的百年大計」，^⑦認為南北雙方都沒有國家觀念，只知爭權奪利。因此，吉野斷言孫去職後南北和議更不會成功，反而孫有理想有信仰，會為自己理念犧牲，孫在位時南北和解尚有轉圜餘地。^⑧吉野自從撰寫中國時論以來，這是他第一次全面性讚賞孫中山，以往他也曾有論及孫氏優點之時，^⑨但那都是點綴性質，而結論也都是貶多於譽。換言之，以往吉野對孫中山一直持否定立場，此刻的言論，可謂其個人對孫中山觀感改變的一大轉捩點，也是其肯定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貢獻的起點。吉野改變其對孫氏之觀點，正意味著其對中國革命運動認知層次的提昇，也和他對孫氏的深入認識有關。這點，本文將在下一章予以更深入的探討。

四、全面支持北伐政策的思想背景

民國八年（1919）二月，南北議和。吉野雖然事前一再強調南北政府要人都太熱衷鞏固自己權益，南北議和似難有所成效。^⑩但他仍然抱著很大的希望，希望南北雙方在列強的壓力下，能認真探討中國和平統一的可能性。^⑪他還呼籲日本朝野不要再一味支援北方政府，應在理性的立場，考慮中國的前途。^⑫事實上，吉野對南北議和的預測，並不離譜，南北議和果然是不了了之。反而議和期間爆發的「五四運動」，卻帶給吉野另一線希望。

五四運動因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交涉失敗而起，然而日本朝野大部分都認為這是單純的一種反日運動。但吉野卻指陳五四運動除具有外交上的意義外，也有內政上的涵意。換言之，吉野認為五四運動有兩大目標，一是對抗外在的侵略主義；一卻是排斥中國的專制政治。因此吉野強調五四運動也代表著青年學子追求政治民主化的熱誠。吉野認為北京的學生們有此表現，象徵著中國青年已經覺醒，受這種覺醒的影響必會反映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層次，中國必會因五四運動而有所改革。^⑬

在吉野對中國政壇日感悲觀之時，五四運動可謂給他一劑強心劑。此刻他把中

^⑦ 吉野作造，「支那南北對峙の形勢」，東方時論，1918年8月，頁46。

^⑧ 同上，頁46-47。

^⑨ 護國軍起義之後，吉野雖一再撰文批評孫中山的領導風格，但對孫的人格却仍持肯定態度，認為孫是一至誠之人，是一位能為主義及信念犧牲自我的革命家。古川學人，「南支昨今の形勢」，中央公論，1916年3月，頁75-76。

^⑩ 同註⑦，頁46-48。

^⑪ 吉野作造，「支那南北統一の前途」，東方時論，1919年1月，頁70-72。

^⑫ 同上，頁72。

^⑬ 詳情請參閱拙文，「吉野作造と中國：五四運動を中心に」，頁88-90。

國的希望寄託在學生運動。他強調當前中國的政治家都熱衷從事政治遊戲，而能真正關心民眾生活，為提高國民生活福祉而效力的就是這些青年學子。^⑧他對青年學生熱心社會教育之事，讚不絕口，認為學生的教育啟蒙運動，關係著中國未來的復興。^⑨

由於吉野把中國復興的希望，寄託在學生運動以及由學生為中心推展的社會教育啟蒙運動；因此他對綿延不斷的內戰，並不特別關心。^⑩民國九年（1920）十一月，孫中山二度重返廣州，重建軍政府之事，他也只是一筆帶過，沒有積極評論。^⑪他曾經極力鼓吹「聯省自治運動」，認為以往南北政府自承正統強求統一的政策，已證明沒有實質效益，主張透過聯省自治，先求省內民主法治，進而籌組聯邦而謀中國統一之舉；反而是一條可嘗試的和平之路。當時，他強調民智的開發，是決定聯省自治運動成效的關鍵。^⑫在論及民智開發重要之際，他推崇孫中山在提倡護法灌輸國民法律至上的觀念，^⑬以及倡導國民革命對中國民眾政治觀念啟蒙活動上的卓越貢獻。^⑭從他對孫中山的評論中，可知他已開始研讀孫的著作，對三民主義的論點也給與正面評價。^⑮不過，他對孫中山的現實政治主張，卻一直持保留態度。^⑯吉野的這種態度，是因他不信任軍政府的實力所使然。換言之，吉野肯定孫中山的政治人格，肯定孫中山的政治理念，但卻不肯定孫中山的政治實力。這也是他對「聯省自治運動」深致期許的原因。如追溯他在民國五、六年間研究中國革命初期，評孫中山媚外，孫為一味追求民主共和政治的空想專家等言論時，^⑰不難發現此刻他對孫的評論，是很中肯的。如前述，孫中山在第一次廣州軍政府時期，外抗段祺瑞內抗岑春煊，絕不因權勢而犧牲自己理念的作風，令吉野心儀。這是他肯定孫政治人格的第一步。^⑱其後，對孫中山著作的研究，也促成他開始認同孫的政治理念。他對孫的人格，政治理念信任的態度，也一再反映在往後他對國民黨聯俄

^⑧ 吉野作造，「支那の近狀」，中央公論，1921年1月，頁185-187。

^⑨ 同上，頁184-185；吉野作造，「支那學生運動の新傾向」，中央公論，1920年3月，頁67。

^⑩ 吉野在民國9年（1920）段祺瑞因失利於直皖大戰而下臺之際，曾特別撰文力責日本以往援段的不當外，對往後綿延不斷的中國內戰，並沒有積極評論。吉野作造，「對支政策の轉回」，中央公論，1920年9月，頁108-111。

^⑪ 同註^⑧，頁188。

^⑫ 同註^⑧，頁187-189。

^⑬ 吉野作造，「支那最近の動亂を論じて政局の將來奈何に及ぶ」，中央公論，1920年8月，頁108。

^⑭ 同註^⑧，頁185-186。

^⑮ 同註^⑧，頁186。

^⑯ 同註^⑧。

^⑰ 同註^⑧。

^⑱ 同註^⑦，頁46-47。

容共政策的評論上。

民國十二年（1923）一月，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舉行會談後，正式接納蘇俄的援助。日本朝野都視此為孫被赤化的象徵，對孫以及容共後的國民黨持警戒態度。⁹⁵在國民黨改組初期，吉野對聯俄容共政策並沒有特別加以置評。但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誓師北伐之時，吉野除表示支持外，並對國民政府赤化論，提出反駁意見。吉野以孫中山革命初期接受日本援助為例，來說明國民政府與蘇俄的關係。他認為，在面對強敵之際，接受外援是求生存之道，並非意味其媚外，更非其甘願淪為傀儡。也許在接受外援之餘，也會承諾給予對方某些特殊權益，但絕不致承諾到喪權辱國之地步。革命黨人一直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先，早期革命黨人如此，今日的革命黨人也如此。在此，吉野斷言國民政府不會赤化，日本也不應因恐懼國民政府赤化，而出兵干涉北伐。⁹⁶

民國十五年（1926）十二月，在國民政府極力推展北伐政策之際，吉野特地撰文介紹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吉野除對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的主要內涵作解析外，也對三民主義成立的時代背景一一加以探討。文中他稱讚孫中山高瞻遠矚，在眾人都只關心種族革命之際，孫中山已認清政治改革及推展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重要性。換言之，眾人將革命的目標，只志在推翻清廷，恢復漢族河山之時，孫中山已將革命目標定位於以民主共和政治的方式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然孫中山也因其意見超越眾人所能理解範圍而飽受爭議，但孫從不退縮。事實上，中國政局的演變，在在顯示僅靠種族主義革命，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的動亂，無一不突顯出民權、民生主義革命的重要性，這也是三民主義仍然被國民黨奉為立黨原則的原因。因此之故，吉野稱讚孫中山為一代偉人。從此刻吉野的言論，可知其已能體會孫中山的用心，已能認同孫以種族革命為手段，以實施民權、民生主義為革命目的的理念。也就是說，孫中山認為中國革命的最終目的在於中國的民主及社會福祉的提昇，「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種族革命只是為達到上述目標的一項手段。這個看法得到吉野的全面贊同，⁹⁷由於吉野有這方面的體認，他修正「孫是一位世界主

⁹⁵ 此事可從犬養毅的態度及政友會的對華政策上得到證實。犬養毅是孫中山在日本政壇的老戰友，但他也不諒解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而日本兩大政黨之一的政友會主張干涉國民政府北伐理由之一就是防止赤化。詳情請參閱拙文，「犬養毅與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援助動機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民國79年6月），頁249-251。又參閱菊池悟郎，立憲政友會史第6卷（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0年），頁276。

⁹⁶ 吉野作造，「支那と露西亞と日本」，中央公論，1926年9月，頁183-186。

⁹⁷ 吉野作造，「三民主義の解」，婦人公論，1926年12月，頁60-63。

義者，是一位為謀求中國民主政治的實施而不惜犧牲民族利益的理論家」等早期對孫的評語。⁹⁸ 吉野這種對孫中山從否定到肯定的過程演變，無一不是反映出他對中國革命認知層次的提昇。至此，吉野對孫是完全信服，這種信服的態度也一一反映到往後他撰寫的中國時論上。

民國十六（1927）年一月，在北伐軍進入揚子江流域，與英國發生嚴厲衝突時，吉野高唱「立即承認廣東軍政府」。在國民政府強收漢口、九江英租界，而英國又力邀日本共同出兵干涉中國革命之時，⁹⁹ 吉野的此項呼籲有雪中送炭之誼。吉野強調此刻承認國民政府，將意味日本已決心放棄既往的帝國主義政策，此項措施必會贏得中國國民的好感。吉野指陳雖然現今中國國民的抗爭目標，不是朝向日本，但日本不應大意，因為日本反而可能是最終目標。為求兩國親善，日本政府應趁早承認國民政府，並應主動放棄日本在華的特殊權益。吉野此刻的言論，除表達其支持北伐的立場外，也顯示出其對北伐的期許。吉野的這種主張中，意味著他寄望北伐是中日關係全面改善的一大轉機。¹⁰⁰

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軍在共黨分子的慫恿下，士兵們在南京攜械搶掠，對外僑施以暴行。此舉引起停泊下關江面英美軍艦開砲轟擊南京，並進而引發外艦與北伐軍相互射擊的「南京事件」。南京事件在日本引起眾大爭議。由於主政的憲政會若槻禮次郎內閣堅守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所標榜的「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外交政策，引起倒閣浪潮，若槻內閣因此於四月十七日總辭。繼任組閣的是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¹⁰¹ 田中義一一向以主張日本擴展大陸政策而著名於世，在野期間，他就宣稱北伐之舉已不是單純的內爭，而是造成東亞危機，進而影響世界和平。他表示「以不干涉內政為藉口而行袖手旁觀之事，無非是放棄我帝國在東亞之地位，也坐視東亞大局秩序崩潰於不顧。身為東亞盟主的我帝國應在保全大局的立場上，更改對支外交，以保衛我帝國，維護我帝國的權益。」¹⁰² 從這段宣言，已知田中的既定立場，日本要干涉中國北伐只是時機的問題。

在田中組閣，日本一片侵華的聲浪下，吉野特別發表時論為國民政府辯護，他

⁹⁸ 同註⑤。

⁹⁹ 栗山喜博，「武漢政府的崩壞過程：四・一二クーデターまで」，收入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集發行，近代中國研究第6輯（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4年），頁186-187。

¹⁰⁰ 吉野作造，「廣東政府を承認せよ：その根據及び態度について」，轉引自中村勝範，「社會民眾黨の中國國民革命への對應：南京政府成立まで」，法學研究，1976年7月，頁17。

¹⁰¹ 中村勝範，「社會民眾黨の中國國民革命への對應」，頁2-3。

¹⁰² 菊池悟郎，立憲政友會史第6卷，頁276。

指陳南京事件並不能意味著北伐軍排外及軍紀腐化。南京事件完全是共產黨一手挑起的意外事件，共產黨徒策動南京事件有多項目的，其中之一就是想陷蔣介石於不義，共產黨徒欲利用列強將矛頭指向蔣介石之際，趁機擴展勢力。因此，吉野強調今日得多數民眾支持者是以蔣介石為首的正統派。共產黨徒只佔國民政府內部的一小股勢力，國民黨正統派雖然也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但並不是激進的排外主義者，他們是主張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來解決與各國爭端的民族主義者。在蔣介石有誠意表示解決問題時，日本應盡量給予寬容，協助蔣氏統一中國，這是鄰國日本應盡的道義責任。^⑭ 這篇時論除反映吉野一貫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外，也表明了他支持蔣介石的立場。

吉野這種對蔣氏的支持，也反映在他對「寧漢分裂」所持的立場上。在寧漢當局各認為自己是正統時，吉野強調繼承孫中山衣鉢，嚴守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才為正統。在此，他提出兩大辨認標準，一、絕不與軍閥妥協者；二、絕不受共產黨指揮者。雖然文中他沒有直呼蔣氏其名，但從其兩大辨認標準中，已知他認定蔣氏為正統。此外，他呼籲日本民眾要支持信奉三民主義的國民黨。認為在中國眾多勢力中，唯有國民黨才可信賴，才能與日本共謀東亞未來的大局。^⑮ 從以上吉野的言論，可知其誠服於孫中山，而且對繼承孫中山衣鉢的蔣介石也是寄以厚望。

民國十六年五月，正當北伐軍沿津浦路北進，不日將推進至山東之際，日本政府突宣佈出兵，理由是保護居住山東地區日本僑民的安全。對田中內閣此項政策，吉野大加抨擊，認為日本沒有權利出兵，田中此舉無疑是侵犯中國主權；此外，他也懷疑以保護僑民為由而出兵的妥當性。吉野舉例反駁稱，如日本發生內爭，是否也意味著中美等國也可以用保僑名義進佔日本？由這個小例就可明瞭日本出兵的不妥，為何田中內閣還要執迷不悟。^⑯ 何況，出兵的結果已阻礙了北伐，穩定了北方軍閥陣勢。因此，吉野呼籲日本應做西洋各國將僑民移居安全之處，並慎重評估出兵後果，以免出兵妨礙中國的統一大業。^⑰

民國十七年（1928）四月，北伐軍再度誓師沿津浦路北進之時，日本政府又再度宣告出兵護僑。五月三日，進駐濟南的日本軍向北伐軍挑釁，因而雙方發生衝

^⑭ 吉野作造，「支那近事」，中央公論，1927年5月，頁108-112。

^⑮ 無署名（吉野作造——著者注），「日支兩國大眾の精神的聯繫」，中央公論，1927年5月，卷首語。

^⑯ 吉野作造，「支那出兵について」，中央公論，1927年7月，頁118-119。

^⑰ 吉野作造，「對支出兵問題」，中央公論，1927年8月，頁92-93。

突。日本軍旋即屠城，此就是名聞中外的「濟南慘案」。吉野認為，田中義一對這件慘案應負政治責任，他列舉四項罪狀，彈劾田中出兵的不當：

- 一、違反正義，日本兩次出兵，都影響南北雙方交戰的形勢。如日本有意助北方軍閥，爲何不公開與北軍結盟。藉護僑之名行干涉之實，日本的正義何在。
- 二、出兵理由不當，今日中國的南北之爭，關係著未來中國生死存亡之命運，而日本藉護僑兩字，就貿然出兵，置理於何在。
- 三、違反經濟效益，僅爲山東一角之僑民權益，日本干冒不韋勞師動眾，此代價是否值得。
- 四、觸發濟南慘案，而濟南發生兩軍衝突，絕不可歸於突發事件。兩軍對峙，本易起衝突，何況日本有援北軍之嫌。此等事本可預料，卻坐視其發生。田中應爲濟南慘案負責。^⑩

民國十七年五月，北伐軍繞道北伐，一路勢如破竹，張作霖眼見大勢已去，於六月三日撤離北京。但翌日，卻被日軍炸死；六月八日，北伐軍進入北京，國民政府完成關內統一大業。吉野對北伐能順利完成，深表欣慰。立即撰文表達他個人祝賀之意，文中也一再推崇孫中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他同時斷言，不論關外是誰掌權，鑑於東北地區民心的向背，東北回歸民國必是遲早之事。^⑪由於他有這方面的體認，因此他強烈反對田中內閣欲將東北與中國分離的政策，認爲此舉不但有導致兩國大戰的危險，而事實上成效有限。^⑫他期待「中日兩國未來的關係，不應被既有的約定所拘束。兩國的關係，應先恢復成白紙，然後再以理性與道義的準則下，探討兩國的利害關係。」^⑬吉野的意思，無疑是希望日本能認真考慮與中國修訂不平等條約，兩國能在一個嶄新的基礎上，重訂未來的外交關係。^⑭吉野所撰寫的中國時論，句句顯示他對中國革命的深刻認識，在在表露其對中日親善的期待。

吉野逝世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三月，臨死前還不忘鼓吹中日親善，力責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之不當。^⑮

^⑩ 吉野作造，「對支出兵」，中央公論，1928年6月，頁64-66。

^⑪ 吉野作造，「支那の形勢」，中央公論，1928年7月，頁80-82。

^⑫ 吉野作造，「對支政策批評」，中央公論，1928年9月，頁79-81。

^⑬ 同註^⑫，頁83。

^⑭ 同註^⑫，頁83。

^⑮ 吉野作造在九一八事變後三個月，撰文指責關東軍的軍事行動是帝國主義行爲，反對任何欲將東北與中國分離的政策。吉野作造，「民族と階級と戰爭」，中央公論，1932年1月，頁28-34。

五、結 論

從以上的研究可知，吉野認為革命的要件在於從事革命的團體是否信仰崇高的理念，是否有嚴謹組織。早期的吉野對中國革命持否定態度，是因為他認為革命黨是一羣沒有信念，只是激憤或嫉妒官僚權勢的在野勢力。爾後，他轉而支持中國革命是因為他開始認定革命黨是一有思想有信仰的組織。

吉野對中國革命態度的轉變起因於護國軍起義，他肯定護國軍時，並沒有肯定孫中山。因此，他對孫中山的評價和他對中國革命態度的轉變並沒有直接關係。他對孫中山的評價，從否定轉變成肯定的關鍵在於他對孫建國理念的看法前後不一。早期他否定孫中山，是因為他認為孫是一位世界主義者，是一位對民主政治的執著勝過對民族利益的維護，為追求民主大業，不惜借重外援而犧牲民族利益者。爾後，他肯定孫中山則是因為中國局勢的演變，在在顯示僅靠民族革命，不能解決中國革命後的問題。中國的動亂，無一不突顯民權、民生主義的重要性。從那時起，吉野開始認同孫的主張，認為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國政治的民主化，和國民的福祉。同時他也贊同孫中山的建國理念，認為種族革命只是手段，革命最終目的還是在求民權、民生主義在中國的落地生根。對孫氏的爭取外援，也認為是為求生存，應予以諒解。

吉野晚期的中國觀，可以說是建立在對孫中山的建國理念的信服上。換言之，對孫中山的再評價，加深了他支持中國革命的信念；對三民主義的再認識，則提供了他一個支持中國革命的理論基礎。